



專題企劃

論「沒收」之法律性質(含法學英文)

張瑋心*

◆ 目次 ◆

- | | |
|-----------------|----------------------------|
| 壹、現行刑法沒收之重點與提問 | 六、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 |
| 貳、我國刑法沒收之內涵 | 肆、美國法上「沒收」之性質 |
| 一、刑罰之性質 | 一、United States v. Tilley案 |
| 二、雙重危險之疑義 | 二、上訴爭點 |
| 參、沒收作為上訴理由之刑事判決 | 三、裁判理由 |
| 一、媒介性交易等罪 | 四、裁判結果 |
| 二、圖利聚眾賭博罪 | 伍、結論 |
| 三、違反貪汙治罪條例 | 陸、法學英文 |
| 四、偽造有價證券 | 一、原文裁判摘要 |
| 五、違反證券交易法 | 二、實用法律語彙 |

關鍵詞

沒收、刑罰、保安處分、犯罪利得、雙重危險

摘要

我國2016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刑法》總則編中的「沒收」制度，共計變動了「沒收」及相關條文達十九條之多。修正後之沒收宣告改為獨立之法律效果、得溯及

* 中國河南科技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台灣法官學院講座。

既往、並且擴大沒收主體及沒收客體之範圍。惟沒收於舊刑法上屬「從刑」，通說亦認為刑事判決之沒收乃刑罰之一部，或具保安處分之性質，果爾，不免疑有違反「禁止雙重危險」（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虞。此外，修正後刑法之犯罪利得，包含犯罪所得及其衍生之利得，兩者與個人所得之間如何釐清認定，法院若執要憑據以能判決，不免難收訴訟經濟之實益。是被告既得被宣告沒收不法所得，另再被判處監禁刑，孰先孰後不問，那麼「沒收」不具刑罰之性質理應先予澄清之必要。對此部分之爭議，美國司法實務上已建立若干判例，本文爰引介United States v. Tilley案說明。冀供參考。

壹、現行刑法沒收之重點與提問

我國2015年修正《刑法》總則編中的「沒收」制度，並將於2016年7月1日施行，共計變動了「沒收」及相關條文達十九條之多，修正的條文計有第2、11、36、38、40、51、74、84條，共八條條文；增訂了第37-1、37-2、38-1~38-3、40-2條，共六條條文；並增訂第五章之一及第五章之二的章名；以及刪除第34、39、40-1、45、46條，共五條條文。由於修正幅度過大，僅就修正之重點，簡述如下¹：

- 一、舊法之沒收為從刑，修正後之沒收則為獨立之法律效果，並從原適用「行為時」的法律改以適用「裁判時」的法律，而得「溯及既往」。
- 二、擴大沒收主體及沒收客體之範圍：（一）舊法第38條規定除違禁物，不問是否屬於犯罪行為人，一律沒收，其餘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因犯罪所生或利得之物，皆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始得沒收。反觀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3項、第38條之1第2項則將犯罪主體擴及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從而，修正刑法之沒收，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無正當理由提供或取得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得沒收之。又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利得者，亦應沒收之：1、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2、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顯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3、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二）舊法「犯罪利得」之沒收只限於因犯罪直接取得，未包括變賣該原物利得之價金或其他原因衍生之物在內。而修正後刑法將犯罪利得擴及：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三）增訂刑法第40條第3項：「第38條第2項、第3項

¹ See <http://www.leeandli.com/TW/NewslettersDetail/5584.htm>, visited on June 20, 2016.



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利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舊法規定犯罪行為人死亡、逃匿、或曾經判決確定而為不起訴、不受理或免訴判決者、或因心神喪失、疾病不能到庭而停止審判等，因無主刑而不能宣告沒收之情形，於修法後均得單獨宣告沒收。亦即，縱欠缺有罪的主刑判決，也可以為單獨沒收之宣告。

三、為落實犯罪利得之剝奪，防止債務人進行脫產，修正後之刑法第38條之3新增沒收物之所有權或其他權利，於裁判確定前具有禁止處分之效力，於裁判確定時移轉為國家所有，但為兼顧交易安全，第三人對沒收物之權利不受影響。

四、沒收之執行：（一）為徹底剝奪犯罪之不法利得，於修正後刑法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3項、第38條之2第1項，分別明訂應沒收之物，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方式認定之。

（二）修正後刑法第74條第5項明定緩刑之效力不及於沒收之宣告。是被告受宣告緩刑時，過去舊法允許暫不執行之情形將不復見。（三）不予宣告沒收、追徵或酌減之情形：1、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增訂犯罪利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2、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亦增訂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利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本次修法較有爭議的部分有二，第一點在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可能遭質疑違反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蓋因沒收為舊刑法上之「從刑」，性質上被認屬刑罰之一部。第二點，倘若沒收之「法律性質」不予澄清，而修正後刑法沒收的獨立法律效果仍具「刑罰」之性格者，那麼未來可能面臨被告提起「禁止雙重危險」之挑戰，是被告既已被判處監禁刑，那麼沒收之處罰性質不免存有疑義。此外，就沒收「不法利得」的定義，雖說修正後刑法包含犯罪所得及衍生的利得，惟兩者與個人所得之間如何釐清認定、或者有無區分之實益？揆諸沒收犯罪之不法利得是否具「刑罰」之性質而言，美國聯邦已建立相關裁判，本文於茲引介United States v. Tilley案說明。

貳、我國刑法「沒收」之內涵

我國多數研究者認為「沒收」含有刑罰與社會預防兩種不同性質。前者為從刑，適用前提必須先有主刑存在；後者則屬於具有社會預防性質之保安處分，可謂對行為

人之行為採取之社會防衛手段²。為辨明「沒收」宣告之法律性格，以下列舉「沒收」於我國主要法規之相關條文內容：

一、刑罰之性質

我國刑法上「沒收」之內涵，包括有：違禁物，一律沒收（第38條第1項）；犯罪行為人於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得沒收（第38條第2項及第38-1條）。至犯罪利得；公務員或仲裁人、有投票權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沒收之（第121、第122條、第131條、第143條）。其他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偽造、變造之通用貨幣、紙幣、銀行券，減損分量之通用貨幣及前條之器械原料（第200條）。偽造、變造之有價證券、郵票、印花稅票、信用卡、金融卡、儲值卡或其他相類作為提款、簽帳、轉帳或支付工具之電磁紀錄物及前條之器械原料及電磁紀錄，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第205條）。違背定程之度量衡（第209條）。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第219條）。散佈、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第235條）。犯本章各條之罪者，其鴉片、嗎啡、高根、海洛因或其化合質料，或種子或專供吸食鴉片之器具（第265條）。當場賭博之器具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第266條）。前二條竊錄內容之附著物及物品（第315-3條）。由上顯見，沒收之財物因屬犯罪使用之工具或犯罪之不當利得而具刑法上之重要性。

其他法規有關沒收之條文內容，略以：（一）行政罰法第26條：「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後段：「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違反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而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佔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犯前項之罪，其犯罪所得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其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應負損害賠償金額者外，以屬於犯人者為限，沒收之。」（三）著作權法第98條：「犯第九十一條至第九十三條（擅自以重製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

² 陳雅譽，論我國犯罪所得沒收法制與實證研究—與美國法制之比較，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組碩士論文，2010年12月，頁13。



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侵害第十五條至第十七條規定之著作人格權者）、第九十五條至第九十六條之一之罪（翻譯受保護之外國人著作，如未經其著作權人同意者，違法重製），供犯罪所用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得沒收之。但犯第九十一條第三項及第九十一條之一第三項之罪者，其得沒收之物，不以屬於犯人者為限。」（四）商標法第98條：「侵害商標權、證明標章權或團體商標權之物品或文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五）電信法第60條：「犯第五十六條至第五十八條之罪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以有線、無線或其他電磁方式，盜接或盜用他人電信設備通信者），其電信器材，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六）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6條前段：「前二條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違法監察他人通訊者；明知為違法監察通訊所得之資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9-1條前段：「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八）醫師法第28條前段：「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

由上，沒收之宣告，除犯罪工具外，財產之沒收取決於被告所違反法律規定之犯罪利得。而實務論者亦不乏以為刑事沒收為刑事案件刑罰之一部。參照我國最高法院78年度台非字第72號判例之意見：沒收為從刑之一種，依主從不可分原則，應附隨於主刑而同時宣告之，除有罪、免刑等判決，於裁判時併宣告外，如諭知無罪之判決，既無主刑，從刑亦無所附麗。從而，沒收在舊刑法時期被視為刑罰，然為避免遇有刑事被告逃亡或死亡之情況，或先前已對其國內財產扣押，卻因法院未為實體判決，以致無法循刑事訴訟程式將其國內外犯罪所得財產沒收之困境，修正後刑法沒收改以單獨宣告之效果，惟對沒收之法律性質並未加以說明。

次論沒收性質若相當於保安處分者，那麼保安處分又否為刑罰？答案恐怕為肯定。援引大法官釋字第636號解釋文要旨：檢肅流氓條例³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受裁定感訓處分之流氓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者，經判決有罪確定，其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與感訓期間，相互折抵之。其折抵以感訓處分一日互抵有期徒刑、拘役或保安處分一日。」係因流氓行為如同時觸犯刑事法律，行為人可能於受刑罰及保安處分宣告之外，復因同一事實而受感訓處分，故規定感訓處分與刑罰或刑

3 2009年1月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012321號令公布廢止。

法上之保安處分應互相折抵，使行為人受憲法保障之身體自由，不致因不同之訴訟程式，而遭受過度之限制。果爾，保安處分因限制行為人身體自由而能與有期徒刑互抵，其不免帶有刑罰之性格。

二、雙重危險之疑義

英美法的禁止雙重危險（Double Jeopardy），我國稱之「一事不再理」原則，是程式法的概念，與歐陸法傳統上的 *ne bis in idem* 原則相當，指就人民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重複之刑事追訴與審判，其主旨在維護法安定性，保障任何經判決有罪或無罪開釋確定者，無庸就同一行為再受一次刑事訴究，而遭受更不利之後果⁴。一事不再理原則固未見諸我國憲法明文，但早已蔚為普世原則，並為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七項所明白保障，自無為崇尚自由民主法治之我國憲法排斥之理，解釋上第八條之正當程式或第二十二條之概括條款都有可能是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我國憲法的落腳處所。

按大法官釋字第636號解釋所揭：一事不再理原則僅適用於刑事法領域。秩序罰、懲戒罰或員警罰不適用之。因此，同一行為如分別經刑事訴訟程式與秩序罰程式（或懲戒罰程式）之追訴與處罰，無論孰先孰後，都無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之虞。也因此，同一流氓行為如經判決有罪或無罪確定，再移送進行感訓處分程式，究竟有無牴觸一事不再理原則，首先就應視不得重複為刑事訴究之「刑事訴究」究竟有無包括檢肅流氓條例之感訓處分程式而定。感訓處分在形式上觀之，固然不屬刑法典上的刑罰或保安處分，但委實說具強烈自由刑色彩，甚至可以說是具加重執行特徵之自由刑。即使不承認是加重的刑事處罰，而依循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的見解，主張感訓處分是一種特別法上的保安處分，但由於感訓處分亦長期拘束人民身體自由，程式上亦均應由法院裁判，且其行為矯治與犯罪防制之功能亦與刑罰目的契合，而具密切關係，是將感訓處分程式定性為「刑事訴究」自無疑義。職是，如果同一流氓行為經刑事事實體判決確定，無論有罪或無罪，只要再經一次同具「刑事訴究」性質之感訓處分程式，就有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問題。

沒收犯罪利得，很明顯非屬秩序罰或員警罰，如斯，倘將其定調為懲戒罰，而不認屬保安處分者，依照本號大法官解釋，「沒收」即無違反禁止雙重危險（一事不再理）原則之問題。

⁴ Vgl. Georg Nolte, in v.Mangoldt/Klein/Starck, GG III, Art.103 Rdnr.178; Schmidt-Assmann, in Maunz/Durig, GG, Art.103 Rdnr. 258, 260. 轉引自大法官釋字第636號解釋許宗力大法官所提之部分協同意見書。



參、沒收作為上訴理由之刑事判決

揆諸「沒收」於我國實務刑事判決之適用情形，最常見的被沒收物且被告鮮少爭執的有兩類，違禁物品及犯罪過程使用之工具。按我國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屬違禁物者，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一律沒收之。參見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案件⁵：「原判決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莊詔欽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刑，處有期徒刑七月，扣案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二包沒收銷燬之判決。」又同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參見強盜殺人等罪案件⁶：「被告犯案所用兇器螺絲起子、榔頭各一把均未扣案，且榔頭木柄已碎裂，被告犯案後復丟入南工路溪中，經警方帶同前往搜尋亦未尋獲，是已無從認尚存在，為免執行困難，故不併予宣告沒收。至於扣案被告犯罪時所著紅色背心、黑色長褲、藍色拖鞋及所攜之斜背包，均為其平日生活所用之物，非被告直接供犯罪所用，亦均無庸沒收。經核原判決於法尚無違誤。」至沒收犯罪利得之情形，則多為被告上訴爭執的一部份理由，諸如：

一、媒介性交易等罪

對於宣告沒收之物，除違禁物或法律另有特別規定外，係以犯人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並以屬於犯人所有者為限，此觀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三項之規定甚明。次就修正後刑法將犯罪利得擴及：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惟個人所得與犯罪所得於沒收時的區分實益如何判斷？畢竟此部分調查困難且易淪為被告單方面的主張或狡辯之詞。參照105年臺上字第1287號刑事判決，該案被告等人上訴成功，理由即指摘原判決宣告沒收之部分將「犯罪所得與個人所得混淆」而違背法令。最高法院採納被告說詞的基礎在於，沒收因犯罪所得之物，且屬於犯罪行為人所有者，應於判決事實記載明白，並於理由內說明其所憑之證據，否則即難謂適法。

摘要該案上訴意旨及法院見解⁷：原判決論處庚○○共同意圖使女子與他人為性交之行為，而媒介以營利罪刑，並諭知扣案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固於事實欄二（二）認定庚○○擔任所屬應召站外務，負責向「馬伕」收取當日應召女子賣淫所得以及發送阿姨帳款，並將所餘收入繳回應召集團。嗣經內政

5 105年台上字第1471號刑事判決。

6 105年台上字第1480號刑事判決。

7 105年台上字第1287號刑事判決。

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臺北市專勤隊（下稱移民署專勤隊）於民國一〇二年九月十七日拘提到案，並扣得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應召集團成員用以聯繫賣淫之行動電話、帳冊、檔及「犯罪所得現金」等物品（見原判決第七頁第三至五行），理由內並說明「（附表一）現金部分為被告等媒介性交易之犯罪所得，其餘物品為犯罪所有之物等情，為被告等供陳在卷，…應依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三款之規定，併予宣告沒收」（見原判決第十八頁倒數第八行以下）。但查，庚○○於一〇二年九月十七日初遭警拘提搜索，依卷附扣押筆錄所附扣押物品目錄表「編號1、2、3、6。」係依序記載「皮夾內現金三萬九千八百元（新台幣，下同）、身上口袋現金二萬七千六百元、背包內現金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元以及一萬零五百元」（見第一九四五八號偵查卷A—2.第二二二頁），庚○○於同（十七）日接受警詢時，即就上揭款項所屬及用途一節，明白供稱：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元係公司的（編號3.），其餘金錢係其個人皮包內的（編號1、2、6.）（見第二一五八〇號偵查卷B—1.第一七二頁正背面），於原審審判期日，庚○○之辯護人並就此辯護稱「原審（即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認定被告（庚○○）的犯罪所得有三筆，其中第一筆、第二筆是分別在被告的口袋及皮夾裡面搜到，這兩筆都是被告個人的財物，只有第三筆在皮包搜到的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元，這才是被告執行業務所收取的犯罪所得，只有這筆才是，其餘兩筆的不是」（見原審卷（二）第八一頁背面）。如果無誤，庚○○似自始即爭執其初始遭查扣之款項中，部分（附表一編號1.(1)、(2)、(6)）款項係其個人所有，與其參與媒介營利性交之犯罪所得（同附表編號1.(3)）無涉，原判決未調查釐清，混同附表其他查獲犯罪所用之物，籠統記載附表一編號1.(1)、(2)、(3)、(6)之現金悉屬庚○○媒介性交易之犯罪所得，經庚○○等供陳在卷，就上揭編號(1)、(2)、(6)尚有爭議之現金遽為沒收之諭知，除與卷內證據資料不相適合外，亦嫌理由欠備。戊○○、庚○○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非無理由，而上述違背法令，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該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二、圖利聚眾賭博罪

依循上開案件之判決要旨，本件圖利聚眾賭博等罪，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對於台灣花蓮地方法院中華民國一〇二年四月十二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認為從刑宣告沒收部分，顯有判決主文與理由矛盾之違法，提起非常上訴，卻遭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檢視本案上訴意旨及最高法院理由：



- (一) 最高檢署檢察長上訴意旨，略以⁸：非常上訴理由稱「一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又判決不載理由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第379條第14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確定判決有關沒收均引用原一審簡易判決書所載附表，即被告許永銳部分：扣案如原審判決附表一至六、十三至十四、十九所示之物均沒收；被告賴來政部分：扣案如原審判決附表一、二、七至十二、十四所示之物均沒收。據此，原確定判決主文從刑之執行力，應及於上開所列原審判決附表所示全部之物。惟查，原確定判決事實及理由欄貳、實體部分四關於從刑宣告沒收部分之判決理由，卻記載『扣案如原審判決附表三至四、六至十、十九所示《應沒收之物》均分別為被告許永銳、賴來政等2人所有…下略），應分別依刑法第266條第2項規定及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宣告沒收』。然原一審判決主文係明確諭知各附表『應沒收之物』始宣告沒收，且原一審判決附表三至四、六至十、十九係就扣案物逐項說明是否宣告沒收。惟原確定判決撤銷原一審部分判決後，就被告許永銳及賴來政所宣告之從刑及合併定執行刑之從刑，並未說明原一審判決被告許永銳部分之附表一至六、十三至十四、十九及被告賴來政部分之附表一、二、七至十二、十四所示『全部之物均沒收』之理由，即逕於主文諭知沒收上開如附表所示之物，理由欄卻僅說明原一審判決所示『應沒收之物』宣告沒收，顯有判決主文與理由矛盾之違誤。二又原確定判決宣告沒收之物『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顯較原一審判決宣告沒收之物『附表應沒收之物』為多（如原一審判決附表六之編號0、1、10、12至15、19、22至24均不沒收，惟依原確定判決卻均沒收），則原確定判決對被告亦屬不利甚明。三案經確定，且對被告不利，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
- (二) 最高法院駁回理由，略以：按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科刑之判決書，其宣示之主文，與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必須互相適合，如有不合，固屬判決理由矛盾；但判決理由矛盾，必致適用法令違誤，而屬判決違背法令，或其理由矛盾，雖未致適用法令違誤，然對於判決仍有若干影響，屬於訴訟程式違背法令者，方得提起非常上訴；若其理由矛盾，尚非適用法令違誤，且對於判決不生任何影響，例如確定判決之主文用語雖欠周全或妥適，但其所載之事實與敘明之理由及所援用之法條皆無錯誤，對於全案情節及判決本旨均無影響時，即非刑事訴訟法第441條所稱審判違背法令，不得據以提起非常上訴。

8 105年台非字第105號刑事判決。

就維持第一審判決有關沒收扣案附表一、二、五、十四所示「應沒收之物」部分，援引第一審判決關於該部分之理由說明「扣案如附表一至附表十…所示應沒收之物均分別為被告許永銳、賴來政2人所有，或屬各電子遊戲場、超商當場賭博之器具、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或供賭博犯罪所用之物…；附表十四所示之物，均係被告賴來政所有供威尼斯電子遊藝場、金字塔電子遊藝場賭博犯罪所用之物或記帳所用之電腦」等語（見第一審判決第22頁第18列至第23頁第4列），是對照各主文所指附表內容、理由說明，足以辨明所宣告沒收者為各該附表所載「應沒收」之物，已具備沒收對象特定之效果；是縱原確定判決主文欄未記載沒收該等附表所示「應沒收」之物，有欠周全，亦係判決製作時書寫簡略，對於本案情節與判決意旨並無影響，依前開說明，不得執為非常上訴之理由。非常上訴意旨指摘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違反貪汙治罪條例

再觀貪汙治罪條例中關於收取工程回扣罪，因其犯罪態樣之特殊隱密性，常會輾轉多人之手，而不易查清其資金流向，是在此類犯罪類型之共同正犯中之一人，因自白犯行、且已明白供稱犯罪不法所得之流向後，如無積極事證該自白犯行之共犯確有取得犯罪所得，而在其他共同正犯犯罪、但無法調查各自分受犯罪所得之情形下，最高法院認為基於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沒收之分配追繳法理，即應就其他共同正犯平均分擔追繳沒收，若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沒收，則以其等之財產平均分擔抵償之。

援引105年臺上字第1353號判決要旨說明：原判決針對黃宗民如其犯罪事實二之（一）、（三）、（四）、（六）部分（二）之（三）未遂收取工程回扣之犯行，依憑黃宗民於偵查中之自白，說明黃宗民就所收取之回扣均轉交或由廠商直接交付予王泰山或綽號「小潘」之成年男子等人處理，經調查結果，復查無黃宗民就所經手之回扣有所得，而黃正隆、王泰山則否認犯罪，無從調查其各自分受所得，因認就其二人關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編號1至7所示應沒收追繳之所得財物，其等實際所分得之數不明，基於各共犯實際犯罪利得分別沒收之分配追繳法理，由黃正隆、王泰山平均分擔追繳沒收，若無法追繳沒收，應以其等之財產平均分擔抵償之。經核原判決所為說明，並無違誤。要無黃正隆、王泰山上訴意旨所稱，原判決論斷有違證據法則、調查未盡及理由不備之違誤。另原判決已敘明黃正隆、王泰山之金融帳戶資料雖無資金異常之處，然此並無法反證推論其等無收取本案工程回扣款之理由。黃正隆、王泰山上訴意旨仍執此為指摘，顯非適法。



四、偽造有價證券

另就偽造有價證券案件的沒收，上訴人兼被告不服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其中上訴人部分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就如其附表一所示未扣案二張本票上偽造之共同發票人「洪麗紅」及「陳浩民」印文，均予宣告沒收，卻未就該本票關於偽造「洪麗紅」及「陳浩民」為發票人部分一併宣告沒收，均屬不當。

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之理由，略以⁹：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陳仁義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上訴人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四年六月，及諭知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關於偽造「洪麗紅」及「陳浩民」為發票人部分之本票二張（含偽造之印文），暨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三份聲明書上偽造之「洪麗紅」及「陳浩民」印文均沒收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被告與否，沒收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定有明文。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票據法第十五條亦資參照。本件第一審判決就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本票，關於「偽造之『洪麗紅』、『陳浩民』印文各一枚（即偽造『洪麗紅』、『陳浩民』為〈本票〉發票人部分」諭知沒收等旨（見第一審判決主文欄第一至四行、其附表一編號一、二沒收之物欄）。原判決予以維持，核與上開沒收相關規定，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僅沒收上開本票上偽造之「洪麗紅」及「陳浩民」印文部分，而未就偽造之「洪麗紅」及「陳浩民」本票部分一併宣告沒收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顯有誤會，要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違反證券交易法

至於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上訴人兼亦被告指摘原判決沒收之宣告不當，對照其部分上訴意旨與前揭偽造有價證券案有些雷同，不免有純粹為上訴而上訴之嫌。最高法院則駁斥¹⁰：犯內線交易罪者，若應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賠償責任，其犯罪所得於扣除賠償金額後，以屬於犯人者為限，始應予沒收，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修正後第七款）定有明文。江秀玲部分，因「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依法受投資人一百餘人之授權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損害，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原判決因而說明江秀玲之犯罪所得，應待民事訴訟損害賠償金額確定後，再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宣告沒收其餘額，爰不於本件宣告沒收之旨，並無違誤。

9 105年台上字第1839號刑事判決。

10 105年台上字第1598號刑事判決。

六、違反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

此外，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案件，又見上訴人等因不服第二審判決之沒收宣告，指摘原判決各罪之犯罪所得之認定未以詳列其所憑之證據與理由而違背法令，提起上訴。該案中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丙○○、丁○○共同犯圖利使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二罪刑部分之判決，改判均論處其等共同犯圖利使未滿十八歲之人為性交易既遂及未遂二罪刑。嗣後原判決被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判決發回更審之理由重申¹¹：我國於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制定之人口販運防制法，即係參考「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¹²」及行政院九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函頒「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於第二條第一款訂定人口販運之定義。而人口販運本質上係由多種犯罪類型歸納出來之犯罪「類型」，並非單一之犯罪罪名，本法雖於第四章定有「罰則」，然所規範者，僅止於係以不當債務約束、利用他人弱勢處境為性剝削、勞力剝削等現行法制無法可罰之行為，為補充性之條文，並非規範全部人口販運之態樣。故本法第二條第二款所稱之人口販運罪，除本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外，尚包括其他法律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後段、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一項除外）、勞動基準法第七十五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按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業於一〇四年二月四日修正公佈，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並修正全文，因行政院尚未訂定施行日期，而未生效。而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為配合修正第二款所引用之法律名稱，於一〇五年五月五日修正公佈，因行政院尚未訂定施行日期，亦未生效）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等罪，在本質上均屬本法所規範之人口販運罪。又本法在刑事訴訟程式上，對於被害人保護措施之程式機制設有特別規定，並於第三十五條採取犯罪所得義務沒收主義，且為配合「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第六條第六項規定之意旨，復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法規定以外，另創犯罪不法所得用以補償被害人之立法例。從而事實審法院於審理觸犯上開其他法律所定之人口販運罪案件，除其法律另定有較本法保護被害人密度為強之規定（如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十條規定在偵、審中，於訊問兒童或少年時，「應」指派社工人員陪同在場，本法第二十四條則僅規定「得」陪同在場）者外，自仍應優先適用本法之特別規定，其審判始為適法。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二人共同對於甲○（未滿十八歲，姓名、年籍、住所等詳卷）分別犯原判決事實欄一之（一）

11 105年台上字第1602號刑事判決。

12 指「聯合國2000年打擊跨國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與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的補充議定書」。



所示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之罪。依上開說明，其等所犯上開該罪，自屬人口販運罪案件，則就上訴人等二人所犯上開各罪之犯罪所得，自應詳為認定，並說明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再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五條規定諭知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以其財產抵償之，始為適法。然原判決對於上訴人二人所犯圖利容留、媒介甲○為性交易之具體次數、所得之金額，並未明白認定，亦未就上開犯罪所得之金額，扣除應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取得）部分之所得財物外諭知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以其財產抵償之，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肆、美國法上「沒收」之性質

美國聯邦法授權法院宣告沒收被告不法利得之執行，主要經由刑事沒收及民事沒收程式之決定作成，至行政沒收則由聯邦行政主管機關執行，無庸檢察官或法院介入。易言之，美國司法實務上對於犯罪所得之沒收宣告，係採以刑事沒收與民事沒收雙軌並行之程式。美國聯邦政府相信只要切斷犯罪人之不法利得自可達到嚇阻犯罪之效果，故而在打擊組織犯罪、毒品、洗錢、恐怖活動等罪時大量運用了財產沒收制度。不過普遍上民事沒收程式之案件數量仍遠較刑事沒收程式之案件多，理由係民事沒收程式減輕了檢察官舉證責任之負擔。然刑事案件判決監禁刑外得一併為沒收之宣告，仍具司法經濟效益，故而聯邦法下幾乎授權各種犯罪之不法利得之沒收¹³。有被告於茲上訴質疑，既已經民事程式裁判返還犯罪所得，卻又遭刑事判決處以監禁刑罰，或反之經刑事判決論處刑罰又被沒收財產，那豈不違反雙重危險之禁止規定？究「沒收」之性質是否為刑罰之爭執，與其經由民事程式或刑事程式宣告無關，本文以下援引United States v. Tilley案之裁判要旨說明。

一、United States v. Tilley案

事實經過緣¹⁴：本件上訴案中，被告等人兼上訴人，尋求依據禁止雙重危險之原則撤銷大陪審團對其販賣毒品罪的起訴書。上訴人認為在先前民事沒收程式之宣告已經對其販售毒品之不法利得作成裁處，因此大陪審團之起訴書對他們構成二次刑罰，違反雙重危險禁止之規定。美國聯邦地方法院拒絕採納被告等人的雙重危險論點，並且駁回渠等之聲請。被告等人爰此提起中間上訴。嗣經法院認定沒收販毒的不法利得非屬刑罰，維持原審駁回之決定。

13 18 U.S.C. § 981(a)(1)(C); 18 U.S.C. § 1956(C)(7).

14 United States v. Tilley, 18 F.3d 295 (1994).

1990年，緝毒署聯合其他部門展開了一項大規模搜查，本案便涉及其中，被告等人販毒之犯罪利得高達數百萬美元。1991年7月25日，依據21 U.S.C. § § 881(a)(6)&(7)規定，檢方針對被告等人名下之財產提起沒收的民事訴狀，請求法院沒收渠等的土地房產。1992年10月8日，檢方遞交了刑事起訴書，指控被告等人在1986年到1991年間的多項毒品犯罪。在1993年2月5日，本案的另外4名被告與聯邦政府達成沒收之協議。被告等人同意繳交大額現金、存款憑證、汽車及其他動產在內，共計65萬美元的財產。依照沒收之協議，聯邦地方法院在2月8日做成沒收之裁判宣告；然而，上訴人兩棟房屋的沒收尚須待刑事判決結果出爐才能執行。同年4月7日，被告等人以同一犯罪案件受到多重刑罰，違背雙重危險之禁止條款，提起駁回檢方起訴的聲請。上訴人主張他們在同一販毒案件中已經受到民事沒收之處罰了。地方法院未採納被告之論點，駁回其聲請。上訴人於茲引用Abney v. United States案裁判，並向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審法院提起中間上訴。

二、上訴爭點

本案的爭點在於，民事裁判既已對被告等人所犯同一毒品案件為沒收之宣告，而檢方又另行起訴被告，刑事判決結果是否對被告構成二次刑罰，而與禁止雙重危險之規定有悖？

三、裁判理由

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審法院駁回被告上訴，理由如下：

雙重危險條款禁止對被告的同一事實案件科予二次「刑罰」。North Carolina v. Pearce (1969)案供參。本案的刑事審判目前還處於未決狀態，如果判決結果為有罪，那麼毫無疑問被告會被科處刑罰。因此，如果先前的民事沒收程式係針對刑事起訴書中同一販毒案件處罰者，雙重危險條款將會妨礙刑事之審判。

美國最高法院已經對違法行為的民事裁罰做出分類，當民事裁罰相當於刑罰的傳統目的，即威懾或應報，而不是補償或賠償因其違法行為對政府和社會造成危害結果時，屬於雙重危險條款定義的「刑罰」。參照United States v. Halper(1989)一案，美國最高法院創設了分析販賣毒品的民事沒收宣告係為懲罰之目的，或為補救性目的之方法。又作為一項基礎性解釋，這一分析方法的重點在於民事補償的金額和實現補救性目的，即賠償違法行為造成政府和社會損害兩者間的關係。本院要澄清的是，Halper案中的裁罰不涉及刑事執行程式，然在本案中沒收不法利得有否違法，對於我們的分析至關重要。



在United States v. Ward (1980)案中，美國最高法院申明，對於政府和社會的賠償才是民事裁罰作為補救性之目的。最高法院闡述當一項裁罰之宣告「與其對社會造成的損害或法律執行成本無關時」，那其性質就應該具刑事性的。

因此，根據Halper案，如果在本案中被沒收的不法利得過高，致使沒收與被告的犯罪行為對政府和社會造成的損害之間不具合理相關者，本院就必須依照同法Sec. 881(a)之規定，將非法販賣毒品的民事沒收程式定義為一項適用雙重危險條款的刑罰。與Halper案中的罰金不同的是，本案中沒收不法利得沒有過度，抑或逾越沒收與犯罪對國家和社會成本的合理關係。沒收販毒的不法利得完全符合補救性目的，用以補償政府從事偵辦、調查、起訴販毒罪行的成本、補償社會在禁毒上的努力、尤當預防性措施失效時對吸毒被害人戒治費用，以及避免不當得利之目的等。

進一步言，本案中被告僅被沒收過去數年間大規模販毒的全部不法利得之部分，即就沒收被告等人當下手邊的那部分收益而已。沒收的金額與其特定的販毒行為所產生的收入是直接相關的，但並沒有充分賠償整個違法行為對社會產生的危害結果。因此，與其粗略估計對政府和社會所造成的成本，沒收尚不能完全賠償違法行為對社會的影響。

即便不存在Halper案的合理相關審查，本院也會裁判沒收販毒的不法利得不構成刑罰，因為合理相關之檢驗基礎是：沒收程式本質上可能構成刑罰是當其涉及對合法財產之剝奪。事實上，普通法規定「財產是源自社會的一項權利，故當財產所有人違背社會法律時，就必須經由沒收的方式將其剝奪」。

簡言之，當政府沒收的財產非來自合法之活動時，被執行沒收的當事人並沒有被剝奪法律賦予他的權利，況且其損失也僅是來自犯罪的不法利得。此與Halper案的13萬美元罰金不同，本案沒收大約65萬美元的不法利得並不是對被告科處刑罰，因為它沒有剝奪被告的自由權或合法財產。誠如毒品收益的所有人並沒有通過正當勞動或其他合法投資，去獲取被沒收的那部分利得。如斯，他不能合理預期法律會保護、寬恕或縱容其持續佔有來自不法途徑之利得。職是，本院認為沒收販毒利得，相當於沒收從聯邦銀行搶劫而來的利得，而不是沒收合法的財產。參照Caplin & Drysdale, Chartered v. United States (1989)案，「政府沒收被告搶劫而來的利得，並且拒絕被告使用它們去支付律師的費用，沒有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蓋因「被告佔有該筆金錢不屬合法所有。」次參Rex Trailer案判決要旨揭示，民事裁罰可以避免不當得利。果爾，沒收不法利得，並不是對當事人的懲罰，其更像是沒收銀行搶劫犯搶來的錢，充其量只是把它歸還給實行犯罪之前原本合法所有的一方。此非刑法意義下之處罰。

四、裁判結果

據上，本院肯定原審駁回被告之聲請，蓋因雙重危險之條款在此不能妨礙被告的刑事起訴。原審決定應予維持。

本案適用法律，參照美國聯邦法典21 U.S.C. Secs. 881(a)(6)(7)；並援引裁判先例 *Abney v. United States* (1977); *North Carolina v. Pearce* (1969); *United States v. Halper* (1989); *United States v. Ward* (1980);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1992); *Penn Central Transp. Co. v. New York City* (1978); *Caplin & Drysdale* (1989)等之意見書。

伍、結論

我國刑法此次修法較大之變革係將「沒收」修正為獨立之法律效果，而不再為舊刑法第34條從刑之認定。蓋因沒收作為從刑之一種，依「主從刑不可分原則」，則應附隨於主刑而同時宣告之，換言之，除有罪、免刑等判決，於裁判時一併同主刑之宣告外，如係諭知無罪、不受理之判決，或被告被發佈通緝時，既無主刑，從刑亦無所附麗。而修正後，因無主刑而不能宣告沒收之情形，改以單獨沒收之宣告。對照下，美國法本將沒收置於民事程式，故檢察官得另向法院提起民事沒收之執行，此與起訴犯罪分別進行而不相妨礙。

我國大法官釋字第45號解釋雖承認沒收為從刑，並補充主從刑不必然關連，可惜未針對「沒收」之法律性質究否屬刑罰給予明確說明，而不免有違反雙重危險之虞：「主刑宣告緩刑之效力，依本院院字第七八一號解釋，雖及於從刑，惟參以刑法第三十九條所定「得專科沒收」，與第四十條所定「得單獨宣告沒收」足證沒收雖原為從刑，但與主刑並非有必然牽連關係。其依法宣告沒收之物，或係法定必予沒收者，或係得予沒收而經認定有沒收必要者，自與刑法第七十四條所稱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緩刑本旨不合，均應不受緩刑宣告之影響。」

為解決過去對於犯罪所得僅能採取刑事沒收程式所造成的困境，實有借鏡美國財產沒收制度之必要，採以雙軌並行，以能適時扣押刑事被告在國內外之不法犯罪所得。修正刑法沒收之條文規定，即希冀不負社會大眾期待追回藏匿海外之犯罪利得，有助解決若干重大膠著案件，例如拉法葉艦採購備金弊案，法國國際商會仲裁法庭就拉法葉艦違約金案已做出對我方有利判決，然拉法葉艦備金案部分，最高檢察署承辦本案的特調小組持續追討軍火仲介商汪傳浦藏匿海外約計五億兩千萬美元備金，卻仍存在一些追討上的法律障礙。固然瑞士方面原則上已同意歸還，但要求我方法院提出



「沒收裁判」，亦即審理拉法葉艦弊案的臺北地院須先為沒收備金等之判決作成，瑞士才同意返還贓款，在此之前這些資產要繼續凍結。我國檢調高層指出，汪傳浦一直滯留海外，未回台受審，依刑事訴訟法規定，我方無法直接對不出庭被告判決，因此法院根本無法提供汪傳浦的沒收裁判¹⁵。

此外，「沒收」之性質不應以其係經民事程式或刑事程式宣告去判斷，同如United States v. Tilley案中美國聯邦上訴審法院之見解：沒收非屬刑罰，因為它沒有剝奪被告的自由權或合法財產。況且美國民事沒收程式不待刑事判決確定，操作上更能收其成效。本文認為不論犯罪利得之沒收、或追徵、追繳、抵償，嚴格來說，性質上均不為處罰¹⁶，蓋犯罪所得乃不法利得，又其非公權力對個人財產權之任意性剝奪；更何況沒收犯罪利得之執行宣告，差可比擬行政或民事裁處之回復原狀或返還不當得利，與罰金刑尚屬有別，因此，溯及既往並無違憲之虞。又以美國兒童性侵害犯罪人登記公告法為例，經聯邦上級審法院認定性侵害犯罪人服刑完畢後仍須為登記，該項命令因不具刑罰性質，而無牴觸事後法原則之論理相當。

至犯罪所得與個人所得之區分實益，本文以為參照刑法第38-2條第1項、第3項規定即可處理；倘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例如媒介成年人性交、提供聚眾賭博場所之現金抽成等。又前述犯罪所得之沒收，如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相信在法務部積極查扣犯罪利得、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之決心下¹⁷，我國近年來發生的諸多貪瀆、經濟、詐欺、毒品及洗錢等案件將能有效受到嚇阻，又被告通常於偵審程式已將犯罪利得移轉，致判決確定後無從執行沒收之憾，修正刑法沒收得為單獨宣告之規定後，被告及其家人或犯罪不法利得之其他受益人，加上溯及既往之適用，恐不易永遠享受犯罪利得，繼續侵蝕社會之公平正義。殊值肯定。

15 See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392786>, visited on June 21, 2016.

16 此與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劉海倫之意見及國內學界通說看法不同。

17 See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258976&ctNode=27518>, visited on June 22, 2016.

陸、法學英文

一、原文裁判摘要

18 F.3d 29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aintiff-Appellee,

v.

Jerry Wayne TILLEY, and Susan Wells Tilley, Tommy Ross
Anderson and Sarah Jane Anderson, Defendants-Appellees.

No. 93-1394.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ifth Circuit.

March 23, 1994.

Rehearing and Suggestion for Rehearing En Banc Denied May 11, 1994.

E. GRADY JOLLY, Circuit Judge:

In this appeal, the defendants seek dismissal of their criminal indictment for selling illegal drugs on grounds of double jeopardy. They argue that the prior civil forfeiture of the proceeds from these drug sales constitutes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s charged in the indictment and that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precludes a second punishment. The district court, refusing to buy into the defendants' double jeopardy argument, denied their motion to dismiss the indictment. The defendants then filed this interlocutory appeal. Because we hold that the forfeiture of unlawful proceeds of illegal drug sales does not constitute punishment, we affirm the district court.



* In 1990, the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and other authorities, began an investigation of large-scale activities involved in this case, which had yield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drug proceeds. On July 25, 1991, the government filed a complaint for civil forfeiture in rem against certain personal and real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defendants pursuant to 21 U.S.C. Secs. 881(a)(6) and (a)(7). On October 8, 1992, the government issued a criminal indictment charging the defendants for the various drug crimes committed from 1986 to 1991. On February 5, 1993, the four defendants in this case entered into a stipulated forfeitur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greed to forfeit significant amounts of cash,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automobiles, and other personal property with a total value of approximately \$650,000. Based on the stipulated agreements, the district court, on February 8, entered final judgment of forfeiture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al property; however, the court stayed forfeiture proceedings with respect to defendants' two homes pending outcome of the criminal trial. On April 7, the defendants filed a motion to dismiss the indictment on grounds that they were being subjected to multiple punishments for the same crimes in violation of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The defendants argued that they had already been "punished" for the same drug trafficking in the civil forfeiture proceeding. The district court rejected the argument and denied the motion. The defendants then filed this interlocutory appeal pursuant to *Abney v. United States*, 431 U.S. 651, 97 S.Ct. 2034, 52 L.Ed.2d 651 (1977).

II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prohibits more than one "punishment" for the same offense. *North Carolina v. Pearce*, 395 U.S. 711, 717, 89 S.Ct. 2072, 2076, 23 L.Ed.2d 656 (1969). The pending criminal trial in this case, if it results in a conviction, would, of course, subject the defendants to punishment. Thus, if the prior civil forfeiture proceeding, which was predicated on the same drug trafficking offenses as charged in the indictment, constituted a "punishment,"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will bar the pending criminal trial.

The Supreme Court has classified a civil sanction for wrongful conduct as a "punishment" under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when the sanction served a traditional goal of

punishment, that is, deterrence or retribution, instead of the remedial goal of reimbursing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for the costs that result from that wrongful conduct. *United States v. Halper*, 490 U.S. 435, 448-49, 109 S.Ct. 1892, 1902, 104 L.Ed.2d 487 (1989). In *Halper*,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d the analytical methodology that will guide our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 civil forfeiture of the proceeds from illegal drug sales in this case served a punitive purpose, or a wholly remedial purpose. As explained below, this methodolog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civil sanction and the amount required to serve the remedial purpose of reimbursing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s a result of the wrongful conduct. We should make clear, however, that the sanction in *Halper* did not involve the proceeds from the crimes charged and the fact that the property forfeited in today's case constitutes unlawful proceeds is crucial to our analysis.

In *United States v. Ward*, 448 U.S. 242, 254, 100 S.Ct. 2636, 2644, 65 L.Ed.2d 742 (1980), the Supreme Court made clear that the compensation of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re remedial goals that a civil sanction may serve. The Court stated that a sanction that bore "absolutely no correlation to any damages sustained by society or the cost of enforcing the law" would be criminal. *Id.*

Thus, under *Halper*, we must classify the civil forfeiture of the unlawful proceeds of illegal drug sales under Sec. 881(a)(6) as a punishment under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if,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amount of the proceeds forfeited was so great that it bore no rational relation to the costs incur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sulting from the defendant's criminal conduct.

III

Unlike the fine imposed in *Halper*, the forfeiture of proceeds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s not so excessive as to ren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forfeiture and the resulting costs to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rrational. The forfeiture of proceeds of illegal drug sales serves the wholly remedial purposes of reimbursing the government for



the costs of detection,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drug traffickers and reimbursing society for the costs of combatting the allure of illegal drugs, caring for the victims of the criminal trade when preventative efforts prove unsuccessful, lost productivity, etc. See *One Lot Emerald Cut Stones v. United States*, 409 U.S. 232, 237, 93 S.Ct. 489, 493, 34 L.Ed.2d 438 (1972) (stating that forfeiture of property under the customs laws serves remedial purpose by "provid[ing] a reasonable form of liquidated damages for violation of the inspection provisions [by] ... reimburs[ing] the Government for investigation and enforcement expenses"); *Halper*, 490 U.S. at 444, 109 S.Ct. at 1900 (stating that costs of de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are remedial in nature); *Rex Trailer Co. v. United States*, 350 U.S. 148, 153-54, 76 S.Ct. 219, 222 & n. 6, 100 L.Ed. 149 (1956) (recognizing market and societal costs resulting from wrongdoing and avoidance of unjust enrichment as remedial purposes); *Ward*, 448 U.S. at 254, 100 S.Ct. at 2644 (recognizing repayment of damages to society as remedial).

Further, in this case, the defendants only forfeited a portion of the total proceeds that their large-scale drug operation produced over several years, i.e., the proceeds on hand at the time of seizure. The amount of the forfeiture bears a direct relation to the specific drug sales that generated those proceeds, but fails to compensate fully for the wrongs done from all the drug sales. Thus, instead of roughly approximating the resulting governmental and societal costs, the instant forfeiture failed to compensate fully for the wrongs done.

IV

Even absent the rational relation test of *Halper*, we would nevertheless be required to hold that the forfeiture of the proceeds from illegal drug sales does not constitute punishment because of the implicit and underlying premise of the rational relation test: The nature of the forfeiture proceeding may constitute punishment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extraction of lawfully derived property from the forfeiting party. Indeed, under the common law, "property was a right derived from society which one lost [through forfeiture] by violating society's laws." 1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299, 4 id. at * 382.

When, however, the propert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was not derived from lawful activities, the forfeiting party loses nothing to which the law ever entitled him. Unlike the \$130,000 fine in *Halper*, 490 U.S. at 438, 109 S.Ct. at 1896, the forfeiture of approximately \$650,000 of illegal proceeds does not punish the defendant because it exacts no price in liberty or lawfully derived property from him. The possessor of proceeds from illegal drug sales never invested honest labor or other lawfully derived property to obtain the subsequently forfeited proceeds. Consequently, he has no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the law will protect, condone, or even allow, his continued possession of such proceeds because they have their very genesis in illegal activity. See generally,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112 S.Ct. 2886, 2894, 120 L.Ed.2d 798 (1992); *Penn Central Transp. Co. v. New York City*, 438 U.S. 104, 124, 98 S.Ct. 2646, 2659, 57 L.Ed.2d 631 (1978). In short, the wrongdoer has nothing, at least nothing to which the law entitles him, to lose from the possible confiscation of the proceeds from his criminal trade. Thus, we believe the forfeiture of proceeds from illegal drug sales is more closely akin to the seizure of the proceeds from the robbery of a federal bank than the seizure of lawfully derived real property. See *Caplin & Drysdale, Chartered v. United States*, 491 U.S. 617, 626, 109 S.Ct. 2646, 2652-53, 105 L.Ed.2d 528 (1989) (st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violate the Sixth Amendment if it seizes ... robbery proceeds, and refuses to permit the defendant to use them to pay for his defense ..." because, "[t]he money, though in [the defendant's] possession, is not rightfully his"); see also *Rex Trailer*, 350 U.S. at 153, 76 S.Ct. at 222 n. 6 (stating that civil sanction may serve to avoid unjust enrichment). Consequently, instead of punishing the forfeiting party, the forfeiture of illegal proceeds, much like the confiscation of stolen money from a bank robber, merely places that party in the lawfully protected financial status quo that he enjoyed prior to launching his illegal scheme. This is not punishment "within the plain meaning of the word." *Halper*, 490 U.S. at 449, 109 S.Ct. at 1902.

V

Accordingly, we AFFIRM the district court's denial of the defendants' motion to dismiss because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does not bar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of the defendants.

AFFIRMED.



二、實用法律語彙

1. 大陪審團的起訴：criminal indictment
2. 依據雙重危險原則：on grounds of double jeopardy
3. 構成刑罰：constitutes punishment for the crimes
4. 提起中間上訴程式：filed this interlocutory appeal
5. 展開了一項大規模搜查：began an investigation of large-scale activities
6. 毒品的犯罪利得高達數百萬美元：yielded millions of dollars in drug proceeds
7. 違背雙重危險之禁止條款：in violation of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8. 民事沒收的宣告：civil forfeiture proceeding
9. 販毒案件：drug trafficking offenses
10. 妨礙未決之刑事審判：bar the pending criminal trial
11. 為懲罰性之目的：served a punitive purpose
12. 補償、矯正性目的：remedial purpose
13. 證明無合理相關：bore no rational relation
14. 「財產是源自社會的一項權利，故當財產所有人違背社會法律時就必須經由沒收的方式將其剝奪」：Property was a right derived from society which one lost through forfeiture by violating society's laws.
15. 僅沒收總收益的一部分：only forfeited a portion of the total proceeds
16. 當下被搜索發現時的不法收益：the proceeds on hand at the time of seizure
17. 非來自合法的行為：not derived from lawful activities
18. 不能合理期待法律會保護、寬恕：has no reasonable expectation that the law will protect, condone